

导 论

本书命名为《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意在探讨儒家史学思想,而着重点又集中于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伦理精神。此前,承蒙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以“经史关系的流变”立项,这本著作便是该课题的学术成果。它与原先计划有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把经史关系集中于伦理的层面,二是把史的叙述改成抓几个关键点。这样处理可以缩短篇幅,论述亦较为深入。

就经史关系而论,史学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制约,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史学之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学。无论是经还是史,其存在与发展,都决定于它们满足社会现实需要的程度,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在文化上的反映则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在这里,儒学与史学二者分别从理论和历史的层面互相补充地充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文化,它既需要理论的概括,更需要历史的印证。

“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这个提法,可以理解为是说的经史关系,更确切地说,它是讨论的儒家的史学。以作者的浅

见，在中国古代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经学与史学有着共同的历史与思想渊源，而且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史又相辅相成，关系至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而二，二而一，因而作为史学的理论和优良传统，往往也是儒家经学的理论和优良传统，或者也是中国文化的理论和优良传统。

限于篇幅，本书重点探讨了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四位重量级的儒家史学大家。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标志着儒家历史哲学的形成，刘知几的史学是儒家史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司马光的史学把儒家史学的政治伦理发展到极致，而章学诚的史学把儒家史学理论推到整个封建社会高峰。

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以求是的精神评价儒家史学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具有源远流长的治史和修史传统。我们这个民族富于历史感，具有高度的历史智慧，善于从历史上吸取经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最有资格引以自豪的地方。中国传统史学，在其数千年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有其足以区别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特点，从历史观点到历史方法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统特色。这种连续的传统有好有坏，它虽成为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史学发展的沉重包袱。当今，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和再评价，这是我们进行史学改革的出发点。

检验人们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有的同志担心会重新陷入“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这两极振荡的命运，同时对“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概括性结论产生某些怀疑。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我想，问题的症结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缺乏唯物辩证法。

人们的认识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这中间包括生活的环境，思想的信仰，个人的阅历，知识的素养，以及思维的方式等等。据有关同志统计，从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作用和价值的基本倾向来说，持否定或基本否定认识的，以从事近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居多；而持肯定或基本肯定认识的，则以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居多。统计者还概述了产生上述倾向性认识的内在原因，以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同志，往往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侮的历史中，容易较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人，亦容易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偏重认识中国文化的缺陷和不足。笔者对这种统计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亦认为对这种认识的剖析失之于肤浅。诚然，知识的素养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所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较多的人们容易看到优秀的历史遗产而产生民族的自豪感，但是也容易看到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产生改革的热望。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此。

要想使我们的认识比较的正确，首先要有一个看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观点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易相同。当然也有用相同的观点和方法而得出的结论却不同的现象。不过，如上所述对传统文化估价的基本倾向来说，这里面会各自有片面性，即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法观点。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靠自我批判达到自我更新，那么结论是只有靠西方文化来冲击。且不说这种看法正确与否，避而不谈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原本也是西方文化思想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就不那么实事求是。

我认为，我们对传统史学的研究还非常肤浅，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教条主义、简单化等种种弊端，没有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做深入细致的总结。建国以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研究的冷落便是明证。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当割断历史，历史也是割不断的。传统史学同现代史学一系相连，传统史学就在我们身边。包括它的历史观点、历史方法，精华也好，糟粕也罢，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认识它、对待它。这里举一个普通的例子。

在中国传统史学悠久的历史上，有着一个相当完备的修史制度，出现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这些典籍，大体是衔接不断，完备而有系统。诸如二十四史衔接不断、包罗万象，以其篇幅宏伟、史料丰富，向读者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卷。其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皆自成系统，前后连接。大凡一种新体例的史书一出，仿效之作接踵而至，因而形成了贯串古今的各类史籍，这是中国修史的一种优良传统。它是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它给后世读者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是后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从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也有一部沿革变迁史。在刘知几之前，史家修史，不以编年，便采纪传，是为通例。有唐一代，《通典》、《史通》问世。而《通典》则源于《史记》。《史记》有“八书”以纪典章制度，《汉书》改作“十志”，历代因之，至杜佑乃“统括史志”，因创政书（或曰典制）之体。后演为《十通》。《四库全

书总目》史部，凡分为正史、编年等一十五类，著录史籍三千余部，近四万卷，可谓丰富多彩。诸般史书，应有尽有，各有源流，自成系统，彼此印证，相互补充，犹如簇簇盛开的鲜花，争艳斗芳，交相辉映。这样好的史学传统，难道不应该给予肯定吗？这丰富多彩的历史典籍，正是我们当今从事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舍此便谈不上历史研究，便谈不上发展新史学。而且这些历史典籍，也是我们撰写历史著作的借鉴。我们写的历史著作，从编纂学上说，都可找到同古代史书的血缘关系。这充分说明，把传统史学说得一无是处而全盘否定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传统史学也颇有应该否定的地方，全盘接受也没有根据。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封建史学，渗透着封建思想和观点，诸如历史循环论、正统论、帝王中心论等，应该批判和决裂。事实上，也曾经多次发动过对封建史学思想的批判。如甲午战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走变法维新之路，曾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集中表现为“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争。这种斗争亦波及于史学界。尔后，梁启超等运用进化史观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并初步提出和论证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这个理论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标志着一个史学新阶段的开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史学是一个更彻底的批判。其后，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历史学发生了空前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历史表明，没有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就没有史学的进步。资产阶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所运用的武器还是从西方学来的历史进化观，但是这个批判已使封建史学走向没落。

不过需要指出，五四时期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采取了简

单的否定的办法，并不能达到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有许多精华是不能当作糟粕批判掉的。比如，司马迁主张“通古今之变”，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要求历史学家把历史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研究，从而探索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说，“通变”的思想和方法，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息息相通的。我仍然认为，由于时代条件之局限，封建时代的史家，不曾探求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他们这些进步的思想和方法，是我们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桥梁，而且他们有价值的探索已经部分地接近了真理，其中有些远见卓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古人的歌功颂德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而正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那些把中国传统史学说得一无是处而又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高唱赞歌的人，未必就是马克思的信徒。我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我们某些史学家也不曾达到古人认识的理论高度，他们也未必就是我们古代优秀史家的传人。比如说，中国古代史家中，颇多博古通今之人，他们进行宏观的历史考察，文约而义丰，知人而论世，就比当今某些史家进步得多。所以说，对传统史学的历史反思和再评价，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都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往往是这样，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精华和糟粕，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都处在一个统一体中，难解难分，相反相成。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能够互相转化。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当然不能理解为周而复始，如章实斋“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之论。如果我们硬要去区别精华和糟粕，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办法，往往是徒劳的。如前所言，中国传统史学中修

史的优良传统，无疑可视之为精华，殊不知，正是这个传统，也扼杀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创新精神，他们不少人喜欢在前人事业的基础上“谨守绳墨”，因循者多，变革者少。如司马迁创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但班氏之后，基本上是谨守绳墨，不敢变通，而书为体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犹如科举之程式，胥吏之簿书，走向事物的反面。再如设馆修史，曾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但亦自有诸多弊端。人浮于事，坐变炎凉，忌讳甚多，责任不专，纵然史官有超众之才，也不能申其志向。刘知几即为一例。可见反思传统史学，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要做到实事求是绝非易事。首先要去认识传统史学，这种认识不是一知半解，不是只知现象不察本质，不是只知局部不知全体，这是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如果以为仅凭一知半解，便凭着个人的感情，宣布同传统史学彻底决裂或顶礼膜拜，那是幼稚可笑的，也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其次，要去认识传统史学，还要提高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包括认识方法、认识水平以及现实感、历史感，亦即对理论和现状的研究。

人们总是站在现代的高度来认识与再认识历史的，从而使自己的历史认识超过前人的水平。事实上，每代人总是要根据其所要回答的历史问题，根据其所达到的认识方法和认识水平，对传统史学做出自己的新认识。这新的认识，即对传统史学的历史反思，便构成了他对传统进行选择、改造与推陈出新的基础。我们有一些同志以保存传统史学为己任，没有勇气做传统史学的主人，而心甘情愿地做传统史学的奴隶，以为这样才是尊重历史，才是还历史之本来面目，这也反映了其认识水平。同这种观点相反，我们研究传统史学，不是为了奉献赞

欣，只是为了改造它，使之适应今天的需要，发展我们的新史学。因此，对传统史学的历史反思要实事求是，这种反思应是客观的、科学的，要花费大气力进行研究总结，这样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二、以经世的标准研究儒家史学

历史研究面向社会需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历史研究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本来是史学发展史上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解放以来，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亦始终没有停止过。因为它不但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受着我国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制约，所以争论虽久，反复甚多，也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政治思想的解放，它势必成为史学理论界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上还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前的史学改革也许正需要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

从史学史上说，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本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解放，也是历史研究发展的动力。脱离现实的历史研究曾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只不过是史学的歧途。

孔子因鲁史记而次《春秋》。《春秋》何为而作？《春秋》以道义。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要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社会作用的重大发现。后来孟子阐述《春秋》之义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

而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正抓住了孔子《春秋》之义的要害。后世史家深受影响，司马迁明确提出“述往事，思来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司马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皆一脉相承，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概而言之，中国史学史上“史学所以经世”的观点是一个贯通古今的历史传统。惟其如此，史学才具备了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才有永久的生命力。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现实，创造未来，即“察古而知今”“述往而思来”，这是古人都非常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成了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

从理论和实践上说，这个问题到了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当今，历史科学要想发展，关键是要满足社会的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史学也算得上一种理论，意识形态，社会的需要是其发展的动力。

当今，公开主张历史研究脱离现实的同志不多了，但是还有。而主张历史学家的责任只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必去联系实际的意见却大有人在。我们说“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必要的，但这决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察古为了知今，述往为了思来。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法，如果我们的史学家只停留在解释历史而不参与创造历史的实践，那还只是完成了“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的任务。

这些同志对社会需要如此冷淡是不无原因的。一是传统的治史之道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里说的传统的

治史之道不是上述博古通今、经世致用的传统，而是乾嘉以来兴盛起来的考据学传统。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西汉经学成了一条追求‘禄利之路’后‘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已创恶例，这是不好的传统。这种学风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但却有深远影响。特别到了有清一代，发展到了顶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治史传统在一大批老一辈学者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自然而然地又用这办法教育影响了一代中年，甚至青年。当然，在老一辈学者中也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们没有低估历史学的伟大变革，但担心人们对传统治学道路认识不足。不可否认，我们不少史学家是受传统治学道路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其特点是不管现实的需要，关在书斋里搜集积累资料，分断代，搞专史，由浅入深，求其专精。尽管这治学方法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它大大限制了学者的视野，脱离现实，斤斤于细微末节的考辨，以为惟有这样的考据才是真正的学问。这样势必拒绝或冷淡具有重大社会价值课题的研究。他们选题的原则只注重学术价值，不注重社会价值。冷淡了社会需要，也冷淡了读者，不愿意做历史的普及工作。退一步说，即使想为现实服务，因为不了解现实，不了解人民群众对历史的需要，也不知道怎么服务法。他们自命为高深的研究成果也只是赢得少得可怜的一些读者。

二是史学队伍自身素质的局限。随着史学的发展，对史学队伍素质的要求亦越来越高。中国古代讲德、才、学、识。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史家一要有史德，公正正直，实事求是，敢于创新，二要有远见卓识，三要有宏博渊深之学，四要有史才。将这些标准放到今天，赋予新的意义，亦可衡量我们的史学队伍。先说史德，就很不够。古代史家提倡直书，我们敢不

敢直书，不少人思想上还有余悸，其重要表现就是历史研究尽量少触及现实问题，怕弄不好找来麻烦，甚至招致横祸。历史研究的对象虽是古往之事，却都有个现实问题。比如，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是个重大历史课题，而且有重大现实意义，研究好了真是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皆佳，但是谁都明白，研究封建专制制度必然会涉及这种制度的现实影响，而我们有些人正是把这种制度的现实影响当作社会主义而奉行着，所以弄不好会被人误认为影射史学，加上攻击现实的罪名。所谓创新精神，在当前就是说要有探索精神，要有改革的勇气。这是很不容易的。再说史识，主要是理论思维能力等。不可否认，这些年，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不浓厚，而对新的史学方法的研究也不熟悉，认识上也较为模糊，这恐怕是史学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史学界面临着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问题，传统的培养史学人才的路子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过分地强调专精，相当地忽视博通，致使知识面狭窄。搞纵向研究，不能上下贯通，搞横向研究，很难左右逢源。如果再说到文理渗透，更是一筹莫展，别说去研究，人家写的书也难读懂。最后说史才，仅以写史的文采而言，像司马迁《史记》那种生花妙笔实在不多见了，史学著作大都板着面孔，读之使人欠伸思睡。为啥那么少读者，这是原因之一。

三、继承和发扬古代史家的创新精神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实结合起来。这一思想经过后世史家的阐释，誉之为“笔削之义”或“春秋家学”，在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一代大师提倡“经世致用”，章学诚在乾嘉盛世人人争言考据的气氛下，也勇敢地打出“史学所以经世”的旗帜，肯定《春秋》、《史记》都是“经世之书”。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里表彰《春秋》“切合当时人事”，表明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曰为当时，二曰讲人事。即是说，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要研究人事的经验教训。如果“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便达不到史学经世之目的，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失去了生命力。章学诚强调史意，明辨古人著述大旨，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卓越见解，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观点的发挥。章氏主张“作史贵知其义”，“学贵著述成家”，把史书区分“撰

述”、“记注”，以为“撰述”或“著述”明确史意，成一家之言，体圆用神，方称为“史学”，而“记注”或“比类”，只不过是史料。其关键之点，就是史学要明乎成一家之言的著述之旨。惟其如此，史学才能发挥经世作用。

中国史学告诉我们，把历史研究同现实联系起来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解放。二者一旦脱离，便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毫无生机可言。

历史学家都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是总结已往，二是回答现实问题。总结已往为的是回答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则必须总结已往，二者有机联系密不可分。所谓“述往思来”、“鉴往知来”、“继往开来”、“古为今用”等等，都是说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家不仅要总结已往，其主要的任务是依据对历史的认识为现实服务，参加创造历史的斗争。历史学家不一定全是政治家，而优秀的功垂青史的历史学家一定是政治家，道理就在于此。历史学家的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如何，取决于现实的需要程度和他们本人的主观条件。光有前者没有后者不行，反之亦然。各个时代都有总结已往、回答现实问题的历史任务，各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但是不容否认，这个历史任务往往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或者变革之后来得更迫切些，似乎不“总结”、不“回答”历史就不容许，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呼唤和史家的感受吧，亦即历史学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从而也给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提供了足可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历史学家不能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前进的脉搏，自觉地接受历史使命，勇敢地担当起总结已往、回答现实问题的历史任务。

这里不妨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在经过秦汉之际风云变幻之后，汉初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以及政治家都要回答秦为什么迅速而亡、汉为什么骤然而兴以及汉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回答这样的现实问题不总结已往当然是不行的。历史学家们自然而然地把历史任务和现实需要二者结合起来。《史记》一书便是应时杰作。比如，他在《秦始皇本纪》中全文著录汉初政治家贾谊那篇绝妙的《过秦论》，其中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国，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无疑，这也表达了太史公的意见。当然，就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也往往遇到总结已往、开创未来的历史任务。《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和博大精深的通史规模，影响千古，为历史学树立了丰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这部“史家之绝唱”成功的奥妙当然要从当时的时代需要和司马迁的主观条件去寻找。这种变革时期或变革之后而出现的总结性历史名著，大多是现实提出了客观需要，从而为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休戚相关，历史的镜鉴光芒四射。

客观历史过程为历史学家提供的舞台是十分广阔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前进，历史学家的舞台和视野亦越来越广阔，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历史有曲折，亦有逆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剥夺了历史学家“鉴往知来”的权力，扼杀了历史学家的创新精神，因而使历史学出现过某些徘徊，某些消沉，某些歧途。乾嘉时代就是如此。不过，在那时，还有些顶逆流而进取的有志之士，继承经世史学的光荣传统，把史学研究与现实联系起来，譬如浙东史学系统的章学诚。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

题，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该时代的史学家，但能够感受时代的脉搏，出色地承担起总结已往、回答现实问题的人，毕竟是史家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时势造英雄，但究竟英雄属谁，这要看史家本人的主观条件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一个能够继往开来、贡献卓著的杰出历史学家，定然有其成功的自身原因，这是因为他们较之其他人更具备担当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综合看来，下面几点似乎是最要紧的。

首先是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

史家要有战略眼光，站得高，看得远，思想也要解放，勇于冲破旧传统。也就是说，要思想先进，理论水平高，又有革新精神。古代史家讲史识，提倡秉笔直书，写一代信史，颇具求实精神，并且主张“通古今之变”，把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研究，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们的一些杰出史学家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勇于创新，这是很可宝贵的。没有远见卓识，鼠目寸光，便巨细莫辨，是非不分，方向不明；没有批判的独创精神，因袭旧贯，谨守绳墨，便不敢跨越雷池，攀登史学的高山。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行列里，颇多有胆有识之士。司马迁可说是胆识兼备，因之他撰《史记》，功业千秋，创纪传体，流芳百世。刘知几颇具批判的独创精神，亦有非凡见解，但相比之下，他胆有余而识则不足，致使其不少见解正误相掺，他对纪传史的总结性评论就是如此。总而言之，见识领先，勇气可贵，舍此不能完成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其次是宏博渊深之学和融会贯通之才。

优秀的史学家都十分博学。这是总结已往、开创未来的学问基础。刘知几说得好：“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槊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不过，尽管“学穷千载，书总五车”，如果没有辨别能力，“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到头来只不过是“藏书之箱篋，五经之主人”，学问虽多也没有用。这说明，光有宏博渊深之学尚不够，还要有融会贯通之才，把学问上下左右融会贯通起来，史家要博而且要通，博而不通，学而无用。所谓通，有两种涵义，一曰纵通，二曰横通，或曰上下贯通，左右旁通。司马迁“通古今之变”，郑樵“会通”，便是博通的典型。《通鉴》的最大特色亦是博通。我在一篇文章中概括通史有三大特色：道通、博通、变通。道通是写史的目的、宗旨，博通是写史的基础，变通是写史的观点、方法。这三通，也正是具备融会贯通之才的具体体现。

以上所论也就是才、学、识、德。一个史家，才、学固然要紧，而识、德，尤其是识，更为重要。蔡尚思先生释“识”为“见识、见解、眼光之类，属于思想认识方面，也可说就是世界观”。我赞同此说。史家贡献之大小多取决于其史识之高下。历史学家的创新精神亦多反映在其见识、见解之新上。其中小者启人智慧，给人以清新之感，大者使人如闻春雷，震人精神，动人肺腑，开人眼界。一般说来，古代的史家难以找到很高明的思想武器，他们的见识和见解只是以其求实的态度在历史的演变中得到某些真知灼见。实践出真知，我们先辈们闪光的思想和卓越见解是在不断探索中获得的。因而我认为，应当十分珍惜这些思想财富。比如，古代历史学家主张“通古今之变”、“会通”、推寻“变通张弛之故”，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要求历史学家把历史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研究，从而探索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说，变通的思想和方法，就其基

本精神来说，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息息相通的。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封建时代的史家，其中包括杰出的史学家，最终亦不能探索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也不可否认，他们这些进步的思想和方法，是我们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桥梁，而且他们有价值的探索已经部分地接触了真理，其中有些远见卓识至今仍然被历史验证是正确的。

历史，作为已经逝去了的客观历史过程，包罗万象，变化万端，犹如蜿蜒千里奔流不息的长河；历史，作为客观历史过程在史学家头脑里的反映，即作为“史学”，亦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然而它也有规律可循。评判千百年史学之优劣，自应有个标准。就内容而论，一要“求真”，二要“创新”。求真是基础，创新是归宿。惟求真方能鉴往，惟创新方能开来。就形式而论，则要注重史学方法论及史书形式之研究，舍此难以做到求真、创新，难以卓有成效地发挥史学的效用。而所有这些，又不能不同史学家的时代、阶级、思想、品格有关。

前面我们谈及作为一个优秀史学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即才、学、识、德，那是从总体上说的。事实上，历史是复杂的，需要做具体分析。

一个杰出史学家的见识、见解往往是良莠并存，正误相间，于此则光彩夺目，在彼则黯然失色。有的能冲破传统思想束缚，锐意革新，然也往往失之于偏颇，有的背着传统思想的沉重包袱，然亦提出过深刻的见解。总之，他们的意见处在矛盾之中。比如刘知几，人们颇赞扬其批判精神和异端色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刘氏的思想中，还有尊重儒学、崇尚正统的一面。《史通》不乏真知灼见，又颇多失误之处，正是刘知